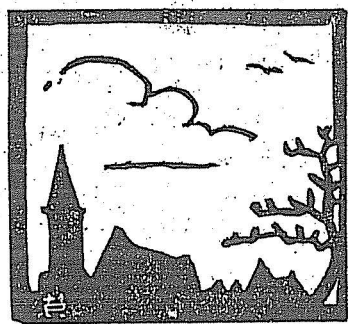




古史辨的史學方法商榷

梁園東

引言

83917
中國的上古史，早已是一篇糊塗帳，從來也未整理清楚。近數年以來，在這篇糊塗帳內，突然起了一個軒然大波！這個波浪，完全是顧頡剛先生掀起來的！顧先生已出了將近百萬言的兩冊書，專門喚作古史辨，以發表他的意見和別人討論的文字。這兩冊古史辨內，包含的材料極多，內容極其複雜，不惟我們看的人找不出一點頭緒，即連顧先生自己也確實聲明，並不在於急急求系統求結論，只是要給上古史開闢一個研究的新途徑。本來在久已擾的極其稀爛的一本賬簿，要顧先生馬上清理出來，自然未免是責人以難，顧先生若能開闢出一個研究的新途徑，使上古史日有光明的希望，恐怕這點功已「不在禹下」，還用說別的！我們讀顧先生這兩本書，當然最好只從顧先生所用的研究方法上看，尤其是經顧先生確實聲明不重結論的時候，我們更只能從他所用的

方法上，以看他的研究。

顧先生既做清理數千年糊塗帳的大事業，那末他所用的方法是什麼？無疑的絕不是神奇妙術，應當只是科學方法一樣似的明白易曉而難做。於是我把古史辨打開一篇一篇讀下去，不料無論怎樣也找不出顧先生的方法來！讀來讀去，最後纔恍然大悟原來顧先生的方法是「神奇妙術」，怪不得我不懂！

也許我到現在還沒有懂了顧先生的方法，也許我所懂的並非真是顧先生的方法，但是無論怎樣我總覺著古史辨中是有許多「神奇妙術」！

讀古史辨的人，最易注意到也最易把捉住的，首先是「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這樣一個奇妙觀念！這個觀念的奇妙，是把那本稀爛的帳簿，一頁一頁把「前面的」整理到「後面」去！據說那本帳簿原先就是「假造」的，假造時是先從臘月三十寫起，一直翻到同年的元旦！

83918 這是顧先生的「發見」也是讀古史辨的人都領教過的那末這本帳根本是要不着了這且不要管他！

但是我們不禁又要研究顧先生究竟是又用什麼方法發見而且敢確實斷定那本帳簿完全是「假造」的呢？尋來尋去終久尋不到顧先生的方法，卻只是到處遇着顧先生的祖師爺！原來顧先生把漢學家的法寶，應用到這本帳簿上來了！用這個法寶一照，那幾面是先寫，那幾面是後寫，立刻都現原形！

可是且慢！究竟這件法寶，能不能照出原形？我們所見的那本帳簿，確是先看到臘月，纔返到正月，但是這種寫法，究竟是「假造」還是因為「別的」緣故？顧先生卻沒有給我們保證！於是我們只好自己來考查一下，那件法寶是不是可用？那本帳簿是不是能那樣假造？

現在我們首先看看那件法寶是什麼！

第一 整理古史方法上傳統的錯誤和古史辨

原來中國上古史既早已是本糊塗帳，所以常常有人清理，凡清理的人自然都要有方法纔能下手，所以這整理古史的方法也早就有。可惜這些方法，幾乎千人一律，誰也不比誰高明，纔把一本糊塗帳弄的更糊塗！我們現在且舉兩個在上古史上較著名的歷史家來說。

上古史傳說在孔子時已成了問題，所以有「刪詩書」的話，孟子更

明明說：「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可見那時古史已不清不過他們究竟是用什麼方法來「刪取」？我們是不能曉得了！我們所曉得有方法整理上古史的，恐怕以司馬遷為第一人。

司馬遷眼中的上古史，是只有「五帝」，他要敘述五帝的歷史，也因爲五帝的傳說故事太多，沒法斷定什麼是真，什麼是偽的，纔創出一種方法來整理，他的方法是：

「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可知司馬遷整理古史的方法，是以「雅馴」做標準，其言雅者始著錄，否則不取。這種方法以現在看，無論誰都可知道不是研究歷史的方法，這是不錯的。

不過雅馴與否，雖不是正確的史學方法，但也不失爲是一種選取史料的方法。因爲一切神奇怪誕的傳說，大半不合雅馴的條件，確實也不是歷史，比較近於事實的，即不神奇。這種方法，恐怕即使極精嚴的史學家，也難保一點沒有。比如現在有兩種記載，一個說袁世凱「乘龍升天去了」，一個說袁世凱是「氣死了」！我們看了當然採取後者。這個緣故，並不是有其他高妙的史學方法，只是按我們的「經驗」推測，乘龍升天絕不會有，是太怪誕了，即不「雅馴」！所以雅馴與否，若能確實從「經驗」和「事實」上判別時，至少不失爲是一種極正當的批評方法，這一點見地司馬遷原是不錯的！

但是我們的經驗很有限，如果從我們自己的經驗上也判別不來時，該怎麼辦？這就非另有其他的方法不可。最可惜的就是因為這點，司馬遷給中國史學界開了一個惡例！

司馬遷遇到一些事情，自己判別不來，也沒有別的方法判別時，就請教古人，他更以「薦紳先生」和「百家言」來分別雅馴，在他意自然以為薦紳先生說的話大半雅馴，大半是真，百家言，大半怪誕，大半是偽，於是他就很大膽地把「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以及其他的許多書，都棄掉不取，其唯一的理由，只是因為「儒者或不傳」。

司馬遷這個錯誤，自然不用多說。須知在不同時代看起來，互相覺着怪誕的事情本來很多。比方，若沒有確實的證明，誰能相信古代的同胞兄弟姊妹，同時又是連襟妯娌；若沒有古代社會的智識，誰能理解古代人二有兒子起碼就是二十二十五三十，若不拿事實給他看，誰又能相信人原來也是有尾巴的，像如這些古怪事情，雅馴的「薦紳先生」敢說麼？萬一「百家言」有類似這樣的古怪，司馬遷只好把他棄掉了，而在另一方面，薦紳先生按自己的經驗很固執的解釋，湯武必是夏商的祖傳老臣，司馬遷又那能知道這事纔真怪誕呢？

所以司馬遷的整理古史，實際上是「沒方法」，於沒方法中纔不得不「找辦法」，去「請教古人」，正好比朱熹的見地很高，要「即物而窮其理」了，然而竟不知道理該怎樣窮，沒法只好仍去「請教古人」，這古人，即是薦紳先生，是儒者，是孔子孟子的書，即成了中國歷史家哲

學家到沒辦法時，想辦法的唯一法門！

二

自從司馬遷開始整理古史，發明了這一條方便法門，以後的歷史家，當然是跟着進來，不料後來古史的期限拉長，不惟五帝三王是古史，即連春秋戰國也成了古史，這裏邊最有關係的，是連司馬遷所走的那條法門，也根本發生變化，從漢時起開始稀爛起來，什麼今文古文，什麼真書偽書，什麼純儒雜儒，弄得一場糊塗！

法門既爛，古史更成糊塗帳，好在儒家的徒子徒孫，單清理他們法門中的事，已經頭暈腦眩，對於古史大體上仍舊貫，像如司馬遷的整理也就很滿意了！

這兩篇糊塗帳，歷唐宋元明一直到了清代，經多少學者的努力，那法門中的事，突然有清明的希望，據清查報告說，那司馬遷原來認定「雅馴」毫無疑義的薦紳先生或儒者之言，即「書」裏邊也有許多是非儒者之言，是怪誕的清理的結果，已把這些怪誕的假的偽的，完全清除出來，所留於法門中的，已完全都是真的確實的「儒者雅馴」之言了！法門因這樣清理完成了！法門既經過改組，那從法門中所看的那本「古史」帳，豈不也是應改組麼？於是又有幾個歷史家出來，從這清理以後的法門，再來整理古史，做這工作最成功的，當然要數做考信錄的崔述。

崔述「考信」的根據，不要細講，人都明白，他完全是根據漢學家所

83920

認定可靠可信非出於偽造的「古經」，如商頌、周頌、大雅、盤庚、呂刑、論語、孟子、春秋、左氏傳等等，以整理古史。在他「相信」以為這些書既可靠，當然上邊所載的「古史」也必可靠了。

崔述這個辦法無疑的仍是走的司馬遷原來的法門。司馬遷原就是以「儒者之言」可信，「百家之言」不可信，崔述不過是進一步明白「儒者之言」裏邊，實際也有許多類似百家而非真正儒者之言在內，所以應當重新從「真正儒者之言」以整理古史，這應當也是司馬遷的原意。所以近人批評崔述是以歷史做「尊經衛道」的工具，這是崔述的錯處，其實崔述並不一定要有「尊經衛道」的觀念，只是這種「方法」是中國人研究古史向來走的不二法門。

但是崔述雖和司馬遷走的同一法門，然而在「方法」上看，崔述卻更比司馬遷壞多了。我們推考當初司馬遷所以不得不走這條法門的原意，是因為要分別「雅訓」、「雅馴」，據我們好意的解釋，尚不失為是選取史料最原始的方法，司馬遷的走那條法門，應當是在受窘的時候纔請教（這自然是純按客觀上解釋，司馬遷未必真是如此），但是崔述就不然，崔述的腦中自然也有雅馴的觀念（如他也不採取百家言），但他並不是以儒者之言來判定雅馴，而是直認真正儒者之言就是信史，這一個差別，至少在「方法」的教訓上是有極壞的影響，我們試把這個差別說明一下：按司馬遷「應有」的態度，「應當是」凡在他的經驗所能判別的眞偽事實以內，他即不請教儒者也可以，甚至不

信儒者信百家言也可以；不過到了他的經驗判別不來時，纔寧取信儒者不信百家，這自然是可原諒的，但崔述就絕不然，他是先立好一個假定，凡可信的儒者之書，就是可信的歷史，充其極，明明在經驗上可判別來百家言也有可信的事實時，他也絕不敢採取，這是很自然很明顯的結果，要不著多解釋，所以純粹以「方法論」上講，按司馬遷的態度，還可編出一部不僅爲「儒者」承認，且應有一些爲「事實」所承認的上古史，而按崔述的態度，編出來的上古史，卻只是一部儒家觀的上古史！

不過崔述這個錯誤，總還可以原諒，他只是太信了儒家一點，但是若實在沒有別的方法以整理這部上古史時，也只好走這條法門，其結果亦不失爲是一部可信的純粹古代儒者一家之言的上古史，絕不會生出其他荒謬。

所可惜的是他方法上的惡影響，他不應該假定可靠的「古經」就是可靠的「古史」，這樣就把「古經」和「古史」混淆起來，使後來研究歷史的人，稍不留心就會走上一條更大的歧途——不料果然隔了一百餘年，竟真有顧頤剛先生被崔述引到這條歧途上來！

三

在我們同時的顧頤剛先生以前，無論司馬遷以至崔述，他們沒有什麼方法，要整理上古史，不得不走儒家那條法門，這是很可原諒的。我們現在，如不滿意他們的結果，應當認清他們的缺點：表面雖是方法錯誤

「不該單信『儒者之言』爲信史——而實際卻是因爲「沒有方法」所致。無論如何絕不應和他們走上同一的錯路纔是不料我們的顧先生，不惟毫不猶疑地走上他們的錯路，而且自己更把這個錯路擴大，簡直走到一條絕路上去！顧先生自己不曉得他走上絕路，而且反以爲是絕妙的「史學方法」，於是對「上古史」大事其整理，結果把一部上古史更弄得一場糊塗，使人簡直莫名其妙，究竟這部中國上古史是什麼一套把戲！

83921

(1) 首先，我們要明白顧先生是和司馬遷崔東壁走了同一法門——這話顧先生絕對不肯承認，因爲顧先生明明批評崔述的「尊經衛道」，太信「儒者」，怎麼還肯走同一的路？其實，在這一點顧先生自己不肯去細想，所謂顧先生仍走了司馬遷崔述的路，是說原先司馬遷崔述整理上古史，沒有方法判別真史僞史，纔不得不「請教古人」，「馬遷請的是『薦紳先生』或『儒者所傳』，崔東壁請的是『真古經』，顧先生呢？仍然是請的『古人』，不過比司馬遷多分別了一個『真古人』，『僞古人』，比崔東壁多擴大了一點，不一定是『真古經』，是所有的『真古書』罷了，在司馬遷以爲凡是薦紳先生所言的，即可信可取，在崔東壁以爲凡『真古經』上所言的即可信可取，而在顧先生只不過是不管薦紳先生也好，不管真古經也好，不管老子墨子離騷都好，凡是可靠的『真古書』，他上邊的記載即可信可取，所差的是司馬遷崔東壁相信了『古書』上『古史』的『真』，顧先生相信了『古

書』上『古史』的『僞』罷了！

以表面看來，「真古書」上記載的「古事」，自然要比僞古書上的記載的古事可靠的多，這自然是不需要講的。但是判定「古史」的真僞，只是依賴古書的真僞，這就算是「史學方法」麼？顧先生相信了「真古書」來整理古史，和司馬遷崔東壁的相信了「儒者之言」來整理古史，其在程度上固有不同，但在「方法上」有沒有不同呢？明白說來，「中國上古史」的需要整理，正是因爲中國「古書」上——即使就是「真古書」——所載的「古史」，凌亂複雜不完備可疑處甚多，纔急需整理，若沒有整理的方法，而仍是就着「古書」說「古史」，這和司馬遷崔東壁的就着「古儒者之言」說「古史」，又有什麼不同呢？所以單就這一點說，雖不能怪顧先生有什麼錯誤，卻應說顧先生整理古史也和司馬遷崔東壁一樣，「沒方法」！

但是我說顧先生整理古史「沒方法」，顧先生一定會跳起來，因爲顧先生明明自己已經開出許多「方法」，而且已經用這些「方法」把古書中的古史，整理成一部「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了，怎麼還說沒方法？

但是且慢！我再說的詳細點：現在比如，顧先生要開始着手整理「古史」了，於是遂把「古書」拿來，「五車」！顧先生第一步先認定這五車「古書」裏邊，據清代漢學家考定，裏邊至少有四車半是假的僞的，不足爲根據，顧先生遂順手一推把那四車半都推到櫃子底下去，只把

83922

那半車真「古書」堆在櫃子上……且住！就按顧先生這一段工作，這是整理「古書」呢？還是整理「古史」呢？按顧先生意思，自然這是整理古史的初步，因為要找尋「真古史」，當然先要找尋「真古書」。但是那四車半「偽古書」裏邊究竟有沒有「真古史」呢？漢學家固然考定那些都是「偽書」，但卻並沒有考定都是「偽史」，即使就是漢學家已說過是偽史了，我們也應當用正確的方法，重新來審查一遍，尤其是上古史漢學家那裏能有精密的史學方法來斷定他的偽，顧先生怎麼推下去？

況且漢學家所謂「真書」「偽書」，那能和「真史」「偽史」的觀念相混？漢學家所謂「偽書」，是說著作者和著作的年代都是「假託」，就說他是偽的，假使這本書裏邊恰巧記着古代中國人真的經歷，以歷史眼光看怎麼也能說他是偽呢？正好比一家子弟，替他老人做了一篇傳記，卻假託是蔡元培章太炎的名字，這是偽的了，但就能「因此」斷定他的內容也偽麼？我們試把顧先生堆在櫃子底下的書隨便翻一本來看，翻起一本緯書，他上邊竟說：

「古初之人卉服蔽體，辰放氏作時多陰風，乃教民撐木茹皮以禦風霜，淘髮闔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人」春秋曆命序

這是不是古代的經歷？又翻起一本亢倉子來，他說：

「几籙氏之在天下也……天下之人惟知母不知父，鵲居鵲飲，而不求不譽，晝則旅行，夜則類處」

這是不是古代的狀況？顧先生用什麼方法把他整理過而棄掉呢？

無疑的按顧先生那種做法，並不是在「整理古史」，他只是受漢學家的指揮，拿「古書」來又加以整理，這話自然過甚，那末退一步，只好說顧先生沒有整理古史的方法了！只有說是和司馬遷崔東壁走上同一法門，以訴之於漢學家的所謂「真古書」，做辨別「真偽史」的唯一「工具」罷了！

(2) 雖然如此說，漢學家所謂「偽古書」裏邊「真史」也實在太少，棄掉也罷了！只看顧先生既把那半車「真古書」留下，且看顧先生用什麼方法整理那上邊的古史！

假使顧先生曾經悟到他是進了司馬遷崔東壁所走的法門，規規矩矩仿照他們的辦法，靠着漢學家清理出來的「真古書」，整理出一部受漢學家洗禮的「古史」，倒也罷了！這樣一部古史，雖不見的怎樣高明，但總比崔東壁的儒者一家之言的古史強一點！但是顧先生明明明白不贊成崔東壁的態度，那能不避開崔東壁的路！遂在半途往斜刺裏一趨，趨到一條絕路上去！這時司馬遷崔東壁和漢學家可都不能負責了，誤到什麼地方只好由顧先生自己負去！

現在我們且看顧先生怎樣來整理那些「真古書」上的古史。顧先生既做了第一步，從五車書裏邊受漢學家指引抽出半車「真古書」，堆在櫃子上以後，即開始第二步工作，因為是研究歷史，遂把那些「真古書」一部一部按時代的先後排起來。假使顧先生真有整理

古史的方法，在這時也不難整理出那一些是真那一些是偽的來。但顧先生眼中，早已是用「真書」來斷定「真史」，用「偽書」來斷定「偽史」。這時眼前的古書既都是「真」的了，那能看出裏邊有「偽史」呢？要整理下去，只好和崔東壁一樣，一條一條把那些書上的古事抄下來，也輯成一本考信錄！但是顧先生一想，這樣一來，豈不是和崔東壁完全一樣了麼？除過能比崔東壁多抄數十條以外，還能有什麼呢？顧先生這時應當是急了！不料人急生巧，顧先生左看看右看以後，突然看出幾種道理來！

第一細看那些古書上所載的古史，明明白白是「古史」上時代愈前的，在「古書」上時代反愈後，而在「古史」上時代愈後的，在「古書」上時代反愈前！第二，一件古事，在時代較前的古書上說的都很簡單，愈到後來就說的格外起勁熱鬧！這是什麼緣故呢？顧先生想來想去，竟想不出個道理，只得疑惑說：「這個「古史」豈不是和我向來研究的「歌謠」同「民間故事」一樣麼？「民間故事」就是原先沒有，都是後來一層一層加上去的，愈到後來，一隻故事愈胖起來！現在看起來，「古史」豈不也是這種樣子麼？」顧先生不想猶可，誰知這樣一想，不覺邪侵入骨，遂糊裏糊塗而卻自以為是大悟地說：「啊！是了！這個「古史」和「民間故事」一樣，完全是「假造」的！」於是遂把他所向來極相信的「真古書」也一下推翻，另加了一個新考語，說「真古書就是偽古史」，那上古史一本糊塗帳，正是由這些真古書上「偽造」或

說「創造」出來，然後「一人倡之……不幸十人和之」，更由那些「偽古書」的著作者加以炫染，遂成了歷史上向來有的上古史系統！

顧先生這樣一想，心中更其明白！於是「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這個根本觀念也出來了，「凡是一件史事，應當看他最先是怎樣的，以後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的」，這樣的根本方法也出來了，「第一第二第三」三個上古史的原則也出來了！觀念，方法，原則，都已齊備，於是顧先生天然應當進行整理上古史的大事業！

讀者幸勿誤會，我這樣不憚煩地描寫顧先生的研究程序，並非故意要「闡微顯幽」，只是因為古史辨中的現象太神奇，怎麼中國上古史完全是由周秦間人「偽造」，竟沒一些真史料保存下來呢？怎麼會有「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這樣一個神奇觀念呢？怎麼研究「一件史事」，竟沒有別的方法，只是要「看他最先是怎樣的，以後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的」？這樣沒用的一個方法呢？就如這個方法，充其量也不過只能如顧先生所說，「不能知道某一種事的真確的狀況」，只能知道一點「最早的狀況」，這又有什麼用處呢？歷史學真敢是從顧先生纔開始成立，竟沒有較好的方法來幫顧先生的忙，讓顧先生很可憐地只要知道一點「最早狀況」，還這樣費事麼？像如這些「古史辨」中的奇離現象，顧先生並沒有告給我們其所以要這樣主張的理由和原因，卻只是掉起書袋找些靠不住的材料去證明他的主張和假定，我們對於這些現象沒法索解，纔只好分析顧先生研究進行時的程序。

究竟看看顧先生怎麼就能發出這些觀念方法的妙論來！

現在我們似乎可以理解顧先生了，原來顧先生因為本和崔東壁走的同一道路，整理古史並沒別的方法，只是全靠「真書」以抉擇「真史」，這樣就要不着整理，只要把「古書」整理一過，分別出真書偽書，抄一抄就夠了！崔東壁這樣做了，但顧先生不肯住手，硬要再從「真古書」中整理下去，但書已是真的了，怎麼再有偽史？既沒偽史，又何必整理？既整理，除非再發見「真書」是「偽書」始可。於是顧先生遂根據了兩件「偶然」的現象，硬把那幾部「真古書」也作弄成是偽的了，而且還把孔子孟子許行以及許多不能知名的作者，都被顧先生加了一個「偽造上古史」的罪名。經顧先生這樣一來，「中國上古史」再要不著任何人費心思去整理了，只要等顧先生的偽史源偽史辨兩部書出版，我們明白了古代這一個大騙術，那上古史還要誰再去整理呢？只有等以後考古學家地質學家從地底下再掘出一部「中國上古史」來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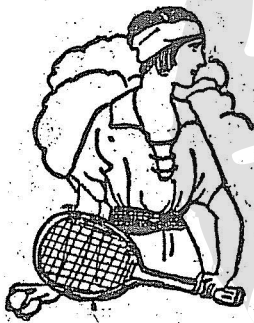
如果我們「暫時假定」我的批評未錯，那末我以為顧先生的一切錯誤，仍然只是由於他整理古史，本來和司馬遷崔東壁同樣的「沒方法」，同樣的走了一個法門，而他卻不承認，硬要進一步的往下做，遂走到一個絕路上去！

(3) 以上寫了一大片，只是說明古史辨中根本沒有「史學方法」，至於顧先生自己所定出來的那幾個方法，我們下邊還要細細考查。現

在另有一個較小的問題而卻和古史辨的方法有重要關係的，是很可奇怪，為什麼「先生在排列好那些「真古書」正要進行整理的時候，怎麼突然又能把那些「真書」一下作弄成是「偽」的？彷彿如做小說的一樣，完全是由作者虛構，又如做假古董的人一樣，存心作偽！顧先生根據什麼理由，起了這樣一個重大的轉變呢？這一點很重要，顧先生應當把他發見的原因，理由和方法明白告訴我們，我以為顧先生雖不做那六七十萬言的兩冊古史辨也可以，而這一點卻應當很鄭重很詳細的說一下，然後再講！不料顧先生對這一點卻提也不提，而只是告訴我們說，他發見「層累地」製造古史的觀念了，他發見上古史上的原則了，他發見整理的方法了，接着就跟着舉例證明下去，但是我們別的且不願意多管，只是要問顧先生究竟本何種見地，有了這種發見？如果這種見地很有理由，那顧先生由此發見出來的觀念方法原則，還有商酌的必要，但是假使這一點若毫無理由，那顧先生的一切一切，豈不是根本應當燒掉麼？

顧先生既不告訴我們，我們當然也不必妄事揣測，只是我上邊代擬的那「兩種現象」，也許是顧先生把「真古書」按時代排好以後必全看到的，也許他真的就是上了這兩種現象的大當，因為他確已受那兩種的影響，竟改成兩種「原則」，列成他古史辨中三種根本原則的「第一第二」兩個，不過這兩種現象是「偶然」的，無論誰若不是和顧先生有一樣的思想背景，絕不會上他的當，這要多說。另外，我想

顧先生不了解「傳說」的性質，恐怕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按他的意思恐怕以「傳說」就是「以訛傳訛」之謂，這實在是極誤的。此外，顧先生誤用了「懷疑」的精神，變成「疑古」的奴隸，誤會了康有為「孔子託古改制」說的意思，在顧先生看簡直不是「託古改制」，直是「偽造古制以壯聲勢」，以及顧先生太受漢學家的支配，至不覺他所研究的是什麼，和多少受他研究「歌謠」「民間故事」的影響，恐怕都是構成他那種冒然假定的根本原因。不過這些我們且不要說他，只是顧先生的這種轉變，很和他所走的那個「法門」有關係。原來顧先生並沒有整理古史的方法，只是從「整理古書」中討生活，第二步把古書整理好了，打開一看，滿望古書給他些新知識，不料古書卻對他講：「我們這裏所有的古史只有『凌亂複雜』」，我們要明白：顧先生不惟是沒方法，而且他是相信「書」的，因為原先着手就是「請教書的」。現在，他所相信的那些「真古書」，既告給他說是「凌亂複雜」，那他天然就不由不相信了，於是也就斷定說，不錯，是「凌亂複雜」。



凡「凌亂複雜」的事情是什麼呢？是「不可靠」的，於是顧先生由這「不可靠」三字一推，滔滔的大論就出來了！

這裏我們且不要說顧先生的錯誤是什麼，只是看了顧先生這種研究法，完全和司馬遷崔東壁「殊途而同歸」，司馬遷和崔東壁是「相信」了真的和好的「古書」上，自會告給他們可信的古史，他們遂根據上「儒者之言」，編出認為可信的上古史；現在顧先生也是「相信」了真的「古書」上，自會告給他一種「可信的」東西，不過現在告訴出來的這個「可信的東西」，和司馬遷崔東壁的改了樣，是一個「不可靠」，於是顧先生也根據上編出他的不可靠的「偽古史」，表面看起來是改了樣，但毫無疑惑的是那些古代史料並未被整理，卻是真的。司馬遷和崔東壁從「古書」上取了「可信」的方面，顧先生是從「古書」上取了「不可信」的方面，其沒有自己的方法，完全相信「古書」的態度，司馬遷崔東壁和顧先生正是一脈傳來的家法。（未完）